驰骋五大洲回望

——从南洋大学到多伦多大学到哈佛

刘宗正 著

高等教育出版社
HIGHER EDUCATION PRESS

驰骋五大洲回望

——从南洋大学到多伦多大学到哈佛

刘宗正 著

高等教育出版社·北京
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驰骋五大洲回望：从南洋大学到多伦多大学到哈佛/（加）刘宗正著. —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0.8
ISBN 978-7-04-030802-0

I. ① 驰… II. ① 刘… III. ① 刘宗正—自传 IV. ① K837.1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138793号

策划编辑 王 莉
责任编辑 王 莉
书籍设计 张志奇
责任印制 韩 刚

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
社　　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
邮政编码 100120
购书热线 010-58581118
咨询电话 400-810-0598
网　　址 http://www.hep.edu.cn
http://www.hep.com.cn
网上订购 http://www.landraco.com
http://www.landraco.com.cn
畅想教育 http://www.widedu.com

经　　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
印　　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开　　本 787×1092 1/16
印　　张 11.75
插　　页 44
字　　数 250 000
版　　次 2010年8月第1版
印　　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定　　价 58.00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，
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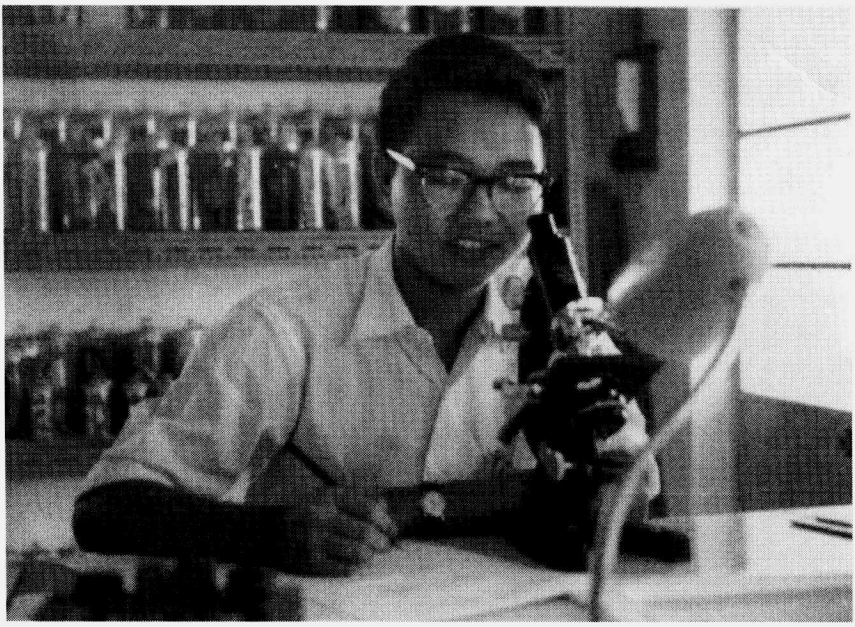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物料号 30802-00

Choong-Chin Liew

Rows of Rubber to Fields of Genes

献给我的家人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前 言

我出生在马来亚（现今的马来西亚）的一个偏僻小村子，成长在英国殖民政府统治、日本军侵占、马来亚各族人民为争取独立自主而斗争的动荡时代。那也是一个以英文学校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主流体系的年代，受英文教育及拥有政府承认的文凭学位，升学与就业前途将一片光明，会有更多更好更理想的出路。而受华文教育和华校生总要面对比较多的磨难。

我作为一名华校生，一生经历了许多曲折，曾经坐困愁城，在崎岖颠簸的道路上举步维艰。但内心铭刻着的发奋图强、力争上游的训诲，时时激励着我乐观积极、脚踏实地不懈进取。我相信，希望和机缘总是在转角之处。在中学时代艰苦及没有大学可读的情况下，我却幸运地踏进了南洋大学的殿堂；经济能力不济却能够远渡重洋赴加拿大深造；一心期望当中学老师，却成就了医学科学研究生涯；曾放弃在美国就读机会的我，却在约40年后受聘到世界顶尖高等学府——美国哈佛大学成立了自己的心血管基因研究组。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还处于闭关自守的年代，在许多人的望门兴叹中，我却到中国开始了讲学和学术交流。原是一介书生，我的医学研究专业却为我储备了创立医学公司的能量动力，使我成功地从学术界

跨足到了企业界。

我于1960年从南洋大学（简称南大）生物系毕业，是南洋大学启迪和培育了我。如果没有南洋大学，我不会有今日的人生历练。如果不是南洋大学，我走的路可能全然不同，也可能不会走得那么遥远、曲折，也就不可能有今日的学术成就和企业发展。在南洋大学受教育的经历加深了我的东方文化底蕴，也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，尤其在云南园（南洋大学校园的别称）四年的春风沐化，使“自强不息，力争上游”的南大精神转化成为我的处世哲学。

我从20世纪70年代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班廷研究院（Banting Institute）设立了自己的研究实验室，开始研究心脏分子细胞和心肌发展及心脏扩张的关系。

2000年，我受聘到美国哈佛大学，在哈佛大学Brigham and Women's Hospital设立心血管基因研究组，研究人类心血管基因和心脏衰竭病症的关系，从中了解不同的病因和不同基因的表达状况。

21世纪初，我从学术界走进企业界，从基础研究转到应用科学研究。我和两位医学专业人士在多伦多创立康特基因控股公司（Chondrogene Ltd.），后更名为GeneNews控股公司，我首创的“前哨原理”（Sentinel Principle）成为我们公司专有的鉴定血液中疾病分子信号的方法，也是该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先锋。

我庆幸我的人生有我从中国南来在马来西亚定居、一生从事华文教育工作的父亲，有出自马来西亚第4代华裔望族的母亲、外婆、亲人手足，有师长和同窗好友等。

如今我年过70，依然继续我的医学研究，还是乐于到世界各地分享我的研究心得。我的家庭、与我相随相伴相助的太太、各有建树的子女们和成长中的孙辈们，让我不知老之将至。

在这里，我要用文字给我的子孙后辈们讲述我这位华校生的人生故事。

刘宗二

2010年6月23日

目 录

前 言 /i

马来西亚：出生和成长的情缘 /1

新加坡：南洋大学云南园的春风沐化 /11

南洋大学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/23

加拿大：苦读、教学、医学研究生涯 /33

中国：讲学、学术分享、人才培训 /41

美国：在哈佛大学的心血管基因研究 /49

从学术界到企业界 /55

我的家园 /63

附件：一年一度新春贺卡 /89

附 录

一、访问中国大学、医学院和研究所 /107

二、家庭成员图 /108

三、我的学生 /109

后 记 /111

马来西亚：
出生和成长的情缘

动荡的少年时代，我辗转完成华文小学、华文中学教育，考上南洋大学。在困境中举步，乐观积极向前迈进，我一直相信希望和机缘就在努力后的转角处。

负笈南洋的父辈

我和马来西亚有很深的情缘。马来西亚是我出生和成长的故乡。

我的祖籍是中国广东大埔。我父亲刘曼光于1910年在那里出生。那是清朝末叶，妇女仍缠小脚，男人在脑后结辫子，慈禧太后已逝两年，清朝国势日衰。我祖父是小地主，可是自我父亲出生到成长时期，中国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变革事件，包括1911年满清政权被推翻及中华民国成立、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及随后卸任、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及军阀割据、1919年的“五四”运动、1927年的大围剿、1931年的“九一八”事变及国共内战等。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动乱，许多地区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，生活困苦的压力促使人们陆续到海外谋生。

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快速繁荣发展，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经济接轨，于2008年在北京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，活跃于世界舞台。我年近百岁的父亲有幸看到今日中国的这番盛世荣景，可是并没有亲自在中国经历这脱胎换骨的过程。

我父亲于1936年离开中国，先到印尼和泰国，然后来到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（现今的马来西亚）。他抵达霹雳州产锡区“近打谷”的矿城怡保，在12哩外的小镇和丰落脚。那个时期，锡价和胶价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冲击一落千丈，马来亚也受到影响，很多人失去工作，不过早前锡业和橡胶业好景带来利惠，华人社群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一般生活上过得去。

锡业和橡胶业在近一百年来是马来亚的两大经济命脉，也是吸引大量华人和其他族群移居马来亚的其中一个重大因素。这里天然资源丰富，早年就有中国商人乘着季候风扬帆来做买卖，以陶瓷和丝绸换取珠宝和香料土产。14 世纪，在贸易活动繁忙船舶集中的马六甲已经有华族集居。太平天国洪秀全举兵反清失败，其随从之中有些离开中国到北美洲或下南洋到马来亚等地。19 世纪末叶及 20 世纪初，来马来亚的华人大量增加。当时，欧洲国家的工业化加速，对锡的需求大增，国际锡价高涨，激发马来亚的锡业迅速发展，接着脚踏车和汽车制造业的兴起，橡胶种植业也在马来亚大事发展。开采锡矿和种植橡胶树及收割橡胶汁，需要大量劳工来操作。有关当局和采矿商及橡胶种植商，向就近的中国和印度招募劳工。甚至有人不顾法理，勾结中国沿海省份地方的买办拐骗强掳少壮男丁，押上“猪仔船”卖到矿场和橡胶园当“苦力”。随着 1930 年实施的移民管制条例随后放宽，有更多华人来谋生或投靠已经在马来亚立足的乡亲。

橡胶树原本是在南美洲的巴西森林野生，霹雳州参政司休罗爵士（Sir Hugh Low）从伦敦的邱园（Kew Garden）带回参政司署花园试种。约于 1890 年，欧洲人开始在马来亚大量种植橡胶树。在新加坡植物园园长黎特礼（H.N.Ridley）的推动下，1898 年在新加坡也推广橡胶种植业。1910 年，橡胶价格飙升。受到橡胶业发展的潜力鼓舞，紧随英国人之后，一些经营采矿业赚到钱的华人商家也转向橡胶种植业。随后橡胶产量供过于求，到了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，胶价猛烈下挫。

我父亲来到马来亚时，这里已是一个英国人、马来人、华人、印度人集居的多元种族社会。英国人任职政府高官、商行要员，经营锡矿场和橡胶园；马来人多数在乡区务农或当教师和公务员；印度人大部分在种植园；华人主要是集居在比较大的城市如吉隆坡、槟城和新加坡，从事各行各业，其中一些善于经商的华人聚集了丰厚资产财富，出现了华人大商贾、胶业巨子、实业家、锡矿场主。

华人社群之中有广东人、福建人、潮州人、海南人、客家人等，为了联络乡亲情谊及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，召集乡亲设立同乡会馆，随后又设立工商、教师、矿业等业缘团体，举办及推广文化娱乐艺术教育活动。

华人移民很早就在马来亚设立华文学校。自19世纪初，一些富裕华人为自家子弟开设家塾，或由个人出资在庙堂等地开学堂，或由族群创办公立学校。早期的教学引用传统学制，教的是中国古典文学。后来受到中国推行由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学的新教育制度影响，加上大量华人移民涌入，马来亚华人社群创办更多华文小学和中学。目前许多历史悠久的华校是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建立。此外，华人移民也把他们的饮食、语文及以佛教为主的宗教、儒家道德和家庭伦理观念、艺术音乐和建筑风格一同带来。如今，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城市和新加坡的街道，有些英文街名和民间惯用的中文街名大不相同，中文街名反映早年华人在当地的生活和行业情境。例如，槟城的Brumah Road，中文街名是“车水路”，当年人们用牛车载水到这里卖；Church Street的中文街名是“义兴街”，是以当年的一个华人帮派为名。

我父亲在和丰小学教书时结识我母亲林慧明。他先后出任和丰的兴中小学、华都牙也的育群小学及中学校长。他终生从事教育工作，忙于教学和校务之外，也参与包括华校教师公会的社团活动，及曾担任霹雳州中华大会堂总务。我母亲出生于槟城乔治市一个颇具声望的家庭，在政府医院任职接生妇，是在马来亚出生和成长的第四代华裔。我的教书先生父亲很受我外婆赏识和看重，并把他招为女婿。那时我外公已不在人世，我外婆撑着一头家。她的职业也是接生妇，性格坚强，受英文教育也懂中文，在她的那个年代算是很了不起的女性。她有两个孩子就是我母亲和我舅舅，他是英文教师。我小时我们一家都住在和丰的外婆家，母亲、舅舅和外婆在家都不说英语，而是以广东话交谈，因此，我不会讲父亲的大埔话。

“鼠疫斗士”伍连德

我母亲的家族出了一位闻名世界的“鼠疫斗士”伍连德医生（Dr. Wu Lien-The）。他是我外婆的叔叔，我母亲的外叔公。伍连德，字星联，祖籍广东新宁（今台山县），1879年3月10日在马来亚的槟城乔治市出生，其父亲伍祺学是槟城著名金饰商。他于1886年获女皇奖学金到英国的剑桥大学留学，1905年考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槟城开业行医。他曾先后在英国、德国、法国及马来亚等地从事热带医学及微生物学研究工作。

1907年，经当时中国外交大臣施肇基大力推荐，伍连德应袁世凯邀请从马来亚回到中国，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堂协办。1910年，一场严重的鼠疫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地区爆发，迅速蔓延到吉林等三省，导致死亡人数超过6万，震惊朝野。疫情紧急时刻，他受委为防疫总医官，采取隔离疫区等有效措施，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扑灭这场鼠疫。他随后召开一项鼠疫国际研讨大会，邀请11国36位代表讨论防治鼠疫的方法。由于他扑灭鼠疫有卓越功绩，1911年受世界鼠疫研究大会授予“鼠疫斗士”（Plague Fighter）荣衔。民国成立后，他受奉派在哈尔滨设立三省防疫总管处，并任防疫总医官。他在中国工作长达30年，在那里推展现代医学服务，并创立了哈尔滨医科大学。日本占领中国后，他于1938年回到马来亚，于1960年去世。

伍连德晚年时，撰写了一本600多页的英文回忆录《鼠疫斗士——一个华人现代医生的自传》。我记得我小时曾在外婆的家庭餐会见过他。1957年，他捐献一批著作和书籍给我的母校南洋大学，我也出席了这项捐献仪式。我不久前阅读了他的自传式著作*Plague Fighter*。

动荡的少年时光

我于1937年9月2日的宁静早晨在和丰出生。那个时期的外面世界却不平静。当时全球还深陷经济大萧条当中。这一年爆发了卢沟桥事件，日本军队入侵中国。1941年12月8日发生侵袭珍珠港事件，我4岁时，日本为了获取橡胶和锡支援其攻侵战事，从北部暹罗南下占领马来亚，于1942年2月到新加坡，并于英军撤退后占领新加坡。日军占领马新时期，这些地区的华人经历了一场惨痛浩劫，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惨无人道的杀害，还有很多华裔年轻人被抓和运往建造滇缅铁路而丧命。苦难激发了人们的国家意识。战后，华人积极争取公民权及参与政治活动，在华人和马来人及印度人三大种族的合力下，加速了马来亚争取独立自主的步伐。

当时为了逃避屠杀，我们全家住到一个小村子的森林区。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，这期间，我的大妹、大弟和小妹相继在1938、1939、1942年出生，还有两个弟弟在战争结束后于1947和1950年出生。战后，我们搬到华都牙也，父亲在当地的育群华文小学任校长，我在那里完成小学。

1945年日本投降。英国军队重返马来亚。但国内许多地区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安。早前日军占领初期，马来人基于民族主义和反殖民政权而支持日军对抗英军，大部分华人因遭日军逼害而支持英军对付日军，少部分华人支持马来亚共产党抗日军，战后英殖民政府一度承认马共为合法组织。后来马共转而向英殖民政府展开武装斗争，进入森林打游击战。我的出生地和丰，因英军和马共对抗而局势紧张。当住在和丰的3名英国人园丘经理遭游击队开枪射杀的事件发生后，1948年我11岁那年，英殖民政府实施紧急法令，严厉对付共产党分子，并强迫华人重迁住入有铁丝网隔离出入受监视和检查的“新村”，以阻止游击分子获取粮食等物资供应。被发现资助游击分子者就会被送进监牢，甚至被问吊处死。这项紧急法令实行了12年，于1960年结束。

1950年，我13岁，基于当时复杂的政治敏感因素，我父亲辞去兴中小学校长职，我们搬到槟城。槟城的乔治市是一个美丽的城市，有红瓦白墙英国式建筑，古色古香的华人庙宇。这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繁忙港口，沿岸一片片白色的沙滩，在晴朗的蓝天映照下熠熠生辉，有“东方明珠”的美称。

我曾在槟城的丽泽小学短暂就读，我父亲受聘到华都牙也担任当地的育群小学校长。华都牙也是霹雳州的一个锡产丰富的小镇，距离怡保24哩，曾是英国殖民政府的行政区，还有一间华都牙也监狱，日军占领时期在那里拷打盘问被逮捕者。

我在育群小学读完小学后，到怡保的育才中学读初中，每天一早就赶搭公共巴士到怡保，放学后搭巴士回华都牙也，为期三年。然后，我考进韩江中学读高中。其时，由槟城华人领袖林连登出资创办的韩江中学的师资阵容鼎盛，高中部的教师就包括严元章等五位博士。在那个时期，马来亚的私立华文中学正面临是否接受政府津贴而改变学制的抉择。华人社会为此意见分歧，一些学生也因为反对华文中学改制而展开积极活动，韩江中学爆发学潮。我在韩江就读一年后，投考钟灵中学读高中二年级，那是陈充恩校长不幸于1952年2月遇难去世的前一年。钟灵中学的创立追溯起来和孙中山有关系。钟灵中学是由创立于1917年的钟灵学校扩展成为马来亚的第一所中学。钟灵学校当初是由槟城阅书报社创办。这阅书报社与孙中山有很深的渊源，当时是槟城的革命党团体，在辛亥革命期间扮演重要的角色。钟灵中学成立初中部之后，于1935年设立高中，1941年日军占领槟岛期间停学，1945年复办。

到我读中学的年代，也正是全球反殖民思潮炽热的年代，许多被殖民政权统治的地区纷纷争取独立自主，当时属英殖民地的马来亚也积极争取独立。我在钟灵中学求学时，学校的学生运动活跃，甚至有些学生因而遭开除学籍。我也参与一些学生运动，由于受到当时反殖民风潮的影响，认为英文是英国殖民政府的语文而历史课文又是以英国历史为主，考试时就故意交白卷以示抗议。在高中第三年级参加剑桥文凭考试考英文科时，我走上考场的讲台，号召在考场的考生罢

考，以示对殖民政府的抗议，校长和训育主任见状立即冲上讲台把我和另一位同学带下去，让考试继续进行。事后我幸运地没有被开除，我在钟灵中学完成高中课程。

我有三个妹妹（其中一妹早逝）三个弟弟。我的外婆给我们每个人都取了洋名。基于父亲是华校校长，我的身份证上写着的洋名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使用过。我们这一辈的男孩排“宗”字辈。大妹玛丽，中学在霹雳女中，后来从华文高级师范毕业任教华校；大弟宗立在钟灵中学毕业后，到纽西兰深造读园艺系，毕业后回马来西亚在园丘任职，同时在霹雳州金宝区参与社会服务并且非常活跃，因癌症于57岁时逝世；二妹赛丽也是教师，是在兄弟姐妹中唯一受英文教育的。我外婆认为女孩是外嫁的不妨送去受英文教育，二妹成为我们之中的唯一试验品。二弟宗田，在南洋大学时因学潮转学到纽西兰攻读数学系，毕业后回马来西亚工作，后来移民加拿大，在多伦多大学从事技术方面的工作至退休；三弟宗石，曾在南洋大学就读一个短时期，转到美国念大学，在他取得大学学位后，便在医院病理系工作，他的指导教授认为他应该更上一层楼，于是到菲律宾天主教医学院念医科，再回到美国攻读专科病理学位，专长于肝脏肿瘤科，后到香港中文大学任病理学教授。他和家人长住香港。

我小时曾经幻想当音乐家，因为看到别人在台上演奏钢琴，姿态优雅，气氛浪漫，觉得非常优美，有时间就在学校自己学弹琴。长大了一些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有机会念大学，将来可以当中学教师。我不是高才生，但在高中时，理科（尤其是数学）是我的强项。

在中学时也曾想过将来要读医科，有一天可以当医生帮助别人而个人的生活也可以得到改善。当时马来亚和新加坡还是受英国殖民政府统治，在马新两地只有一所大学即马来亚大学（马大），但是设立在新加坡。这间大学招收的学生是以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文中学毕业生为主，学额有限尤其是医学系的竞争激烈，华文中学毕业生要想挤进这扇窄门很难。许多富裕人家把孩子送去澳洲及欧美等国家的大学深造。我是来自中下阶层家庭的孩子，没有出国深造的经济能力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